
中医救护医院及中央国医馆和 赈济委员会的合作

徐建云

摘要：从所掌握的档案资料入手，叙述了中医救护医院和中医救护大队的建立，并着重阐述了中医救护医院和中医救护大队及其主管部门中央国医馆与赈济委员会的合作关系。而中医救护医院、中央国医馆和赈济委员会的精诚团结、卓有成效的合作，为中医救护医院展开积极有效的救护工作创造了一定条件。

关键词：中医救护医院；赈济委员会；中央国医馆；医学史

一、中医救护医院的建立

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军民为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所感召与激荡。抗日军兴，挽救民族危亡业已成为当时社会各界最具挑战、最严峻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下,全国民众组织起各种抗日救国的团体,积极支持和配合抗战大局。充分显示了全民众志成城,一致对外,共赴国难的高昂而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气概,也反映出全民抗战,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戮力御敌的壮志豪情。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氛围中,中医界同仁也毫不例外,自发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和中医救护大队,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姿态,自觉自愿地投身到抗战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这也有力地表明了中医界同仁与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情怀。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及时有效地救护因战争而致的伤病员的现实需要的形势,中医界也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医疗救护的职责,具体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和中医救护大队。因此,中医救护医院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应运而生的。从我们目前掌握的当时的档案资料得知,首先是成立了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这个医疗组织机构的董事会,主要是由国民党方面的党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医学专家等组成。下面就是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董事衔名(即 34 人名单):于右任、陈立夫,焦易堂、李宗仁、丁惟汾、居正、孙科、陈果夫、张继、马超俊、冯玉祥、朱庆澜、刘百闵、李宗黄、梁寒操、张群、谷正伦、吴开先、洪兰友、李德全、江定、洪陆东、陈郁、陈焯、王用宾、彭养光、覃振、王漱芳、冯炳南、张简斋,饶凤璜、黎剑虹、薛正清、张钟毓。从这张名单来看,几方面人士是一目了然的。如于右任、陈立夫、李宗仁、居正、孙科、陈

果夫、冯玉祥等无疑是国民党的党政要员；而焦易堂是身兼中央国医馆的馆长，陈郁为中央国医馆的副馆长；而张简斋等人则是中医专家。在当时的国统区所建立的中医救护医院，主要集中在仍由我国军队控制的省区，即尚未沦陷的一些省区。中医救护医院，从行政隶属关系与业务领导关系来说，应该由当时的中央国医馆主管。因此，我们发现，赈济委员会也确实是和中医救护医院及其主管部门中央国医馆进行有关合作的。除有中医救护医院之外，为适应战争的实际需要，当时还组建了中医救护大队，可以随时开动，奔赴战场，以积极及时地救护我方在战争中受伤的人员。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就曾参与筹建中医救护大队，并邀请张简斋担任中医救护大队的大队长，这种赤诚的爱国举动，理应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由衷地敬仰和缅怀。

二、赈济委员会和中医救护医院的合作

赈济委员会，是在1938年4月27日成立的，它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它的前身是赈务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民政机构，它具体办理全国赈灾、济贫和监督慈善机关事项。赈济委员会下辖有赈抚工作总队、运送配置难民总站等机构。而作为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庆澜，不仅担任过一些行政区的主官，而且在1936年后就任赈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开始从事民政工作。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任在北平成立的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在中医救护医院与赈济

委员会的合作中,朱庆澜发挥了重要作用。

赈济委员会,作为在抗战非常时期所成立的一个民政机构,它必须安置和救济因战争爆发而造成的大量难民,以及遭遇自然灾害而无奈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流浪难民。因此,安置与救济的任务非常繁重,再加之一切要服从战争的需要,从全民抗战的大局出发来考虑和安排极为有限的经费使用。尽管如此,赈济委员会和中医救护医院的合作还是卓有成效的。关键是无论赈济委员会还是中医救护医院,大家目标一致,一切为着全民抗战,一切为着民族生存。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档案资料来看,赈济委员会曾拨款资助和支持中医救护医院的。

在赈务委员会公函,字第 865 号的记载显示:“案准。贵会二十七年(1938 年)二月六日渝字第二号函,嘱自二十七年二月份起,每月拨助中医救护医院经费五千元。另一次拨助该院制药费五千元等由,事关救济,自应照办,相应函复,即希查照。

转知备据,具领为荷。此致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

在这份由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致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的函件中,主要表明了如下的两层意思:① 由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在 1938 年 2 月 6 日向赈务委员会请求财政资助的函件已收悉,同意自 2 月起,就每月拨助中医救护医院经费 5 000 元。与此同时,一次拨助中医救护医院制药费 5 000 元。② 希望中医救护医院得到函复后,能及时“备据具领”。

也就是说可以把拨助给他们的经费用到最需要的方面上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庆澜本人就是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的成员,他可说是一人两任,身兼两职。也许,把他邀入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正是看中了他是赈济委员会的委员长。

在1938年12月,赈济委员会两次致函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都涉及中医救护医院的事情。一次是涉及拨助经费的问题,而另一次则是关于中医救护医院院长人选问题。这也可见,赈济委员会和中医救护医院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两者间的合作是全面而具体的,在中医救护医院的最重要方面,都能看到赈济委员会的介入及其作用。我们看到的这份函件的主要内容是:

“中央国医馆焦馆长鉴:渝字第八九(89)号函悉。查西安中医救护分院经费迭经本会先后核拨,由中医救护医院转发在案,除电朱兼院长将该分院办理状况及经费收支情形见复,以凭核办外,特复查照。”

在这份函件中透露出来的主要信息有二:① 西安中医救护分院的经费,虽经赈济委员会核拨,然而还是通过中医救护医院转发的。也就是说跟赈济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的是中医救护医院。这是两个身份平等的行为主体在进行交往合作,尽管中医救护医院名义上应属中央国医馆领导。中医救护医院是在抗战非常时期临时成立的,它有行为主体的身份。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② 作为受助单位的西安中医救护分院,尚能把“分院办理状况及经费收支情形见

复”，这也显现出对赈济委员会的尊重。中医救护医院的具体运作情况及所做的救护工作状况及时向赈济委员会通报，是为了赢得更多更好的理解与支持，这是十分务实而明智的做法。而向赈济委员会报告“经费收支情形”，则更是高明之举，到底是专款专用，把拨助的有限经费用于救护工作的刀刃上，还是怎样的，中医救护医院实话实说，这自然使赈济委员会倍感欣慰与满意。否则，还是会有所疑惑，对拨助的经费到底怎么用的，假如是一无所知，那么就会缺乏互信。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交流是理解的前提，理解是合作的关键。相互通报，增进了解，自然是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最好最深厚的基础。

在赈济委员会致中央国医馆焦易堂馆长的另一份函件中是这样写的：

“中央国医馆焦馆长鉴：十二月二十日渝字第八八五九(8859)号函敬悉。关于改组中医救护医院拟会同召集该院董事会协商一节，极表赞同。兹定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集会议，其会议时间即请酌定。至于该院名称拟改为中医救济医院，并聘任饶凤璜先生为院长。如荷赞同，所有开会通知及聘函并希查照，主稿会印封发为荷。”

在这份函件中，集中透露出来的主要信息是两个方面的：① 中央国医馆向赈济委员会通报了关于改组中医救护医院拟会同召集该院董事会协商一事，中央国医馆的主动诚恳的态度，使赈济委员会倍感欣慰，因此“极表赞同”，这是坚定支

持中央国医馆、中医救护医院工作的具体表现。② 对于中医救护医院的具体改名和人事安排,赈济委员会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明确的意见,那就是将中医救护医院更名为中医救济医院,这样做,一是扩大了救护对象的范围,二来也显示出与赈济委员会的密切关系,并自然地与赈济委员会的成立宗旨相契合的。这样做的目的真正是和衷共济、同心协力。至于中医救济医院的院长人选,赈济委员会提出聘任饶凤璜先生。值得注意的是,饶先生本人原来就是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的成员。也就是说推荐(推举)中医救护医院的董事来担任院长一职,亦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更能为中央国医馆方面认可。由此可见,赈济委员会和中央国医馆、中医救(护)济医院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具体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医界人士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尤其是作为中医的主管领导部门——中央国医馆能够及时有效地展开工作,积极参与组建了中医救护医院和中医救护大队,奔赴抗战的前线,充分显示出中医队伍高昂而振奋的民族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过硬而精湛的业务素质。热烈的爱国情怀,实在的爱国举动,使得中医赢得了社会民众的一致认可、理解与赞扬。因此,中医的救亡图存和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一致性,这是中医之幸;而中国有中医,也是中国之福。中医救护医院和中医救护大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做了许多救死扶伤的好事、实事,显示了中医实在的价值,为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做了最好的宣传。中央

国医馆为着中医救护医院的良好发展,联络了由许多国民党党政要员、社会贤达、各界名流组建的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医救护医院、中央国医馆和赈济委员会的精诚团结、卓有成效的合作,为中医救护医院顺利展开有关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我们所不应忘却的。

参考文献

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真. 中华民国史大辞典[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